

民国初年青年森恪与“满洲租借”关系之考察

颜 龙 龙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Mori Kaku and Manchurian Leas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 Longlong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ll circles in Japan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revolution. Besides,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had to contact frequently with these circles because of financial shortag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employees of Mitsui & Co, represented by Mori Kaku (森恪),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losely consulted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Sun Yat-sen (孙中山) and Huangxing (黄兴), on the Manchurian Lease (“满洲租借”). By investigating the negotiation among Sun Yat-sen, Huang Xing, Mori Gaku and so forth on the Manchukuo Lease, it can be found that Mori Kaku's early ideas, to exp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re the highest criterion for him to participate Chinese affairs. His in-law relationship with Masuda Takashi (益田孝)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uda Takashi and Inoue Kaoru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to negotiate with Sun Yat-sen, Huang Xing and Inoue Kaoru (井上馨) under mutual trust. The fact that Mori Kaku negotiated with the Chinese side, Masuda Takashi communicated with the Japanese side, and Inoue Kaoru instigated within the senior levels is the key element of the negotiation system named “Manchurian Lease” which a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es relationship.

Keywords: Mori Kaku, expand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Manchurian lease

关键词：森恪、国权扩张、私人关系、“满洲租借”

前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爆发起义，因为该年为旧历辛亥年，所以史称“辛亥革命”。在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政府为维持正常运转与继续北伐，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首领不得不向外部势力，或以合办名义、或以抵押名义进行借款。三井物产相关人士就曾在此背景下与革命派进行密切接触，并策划参与了“满洲租借”案。

有关“满洲租借”问题研究现主要见于日本学者藤井昇三、久保田文次，以及中国学者俞辛淳、杨天

石等人。¹⁾ 以上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满洲租借”的真伪考证与“满洲租借”的主要人物孙中山身上，并就“满洲租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²⁾，但是以上研究仍有不足，即忽略了该事件的重要的筹划者、参与者森恪及与益田孝、井上馨之间的合作机制。

现今关于森恪的相关内容多以传记形式进行叙述³⁾，而学术性的成果则主要集中在田中内阁成立前后，其作为众议院议员、田中内阁外务政务次官、犬养毅内阁内閣官房官长时，对华主张的形成、制定、构造等方面。⁴⁾ 关于森恪与“满洲租借”直接研究则推进到森恪为本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的水平上。⁵⁾ 在中国学界关于森恪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其与益田孝之间关于“满洲租借”信函的真伪考证上。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日学界对于森恪及其在日本国内人物关系研究与“满洲租借”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空白阶段，另外对森恪从事该项活动的内在动因亦未有提及。

现今关于森恪的研究多依据山浦贯一所编《森恪》，因该书作者与森恪既处同时代又有亲交关系，同时该书还包括了大量森恪书信以及与森恪有关的个人回忆，所以史料价值极高。但是该书关于“满洲租借”的相关内容则相对零碎，且有错漏。因此为理清“满洲租借”的相关情况，本文拟结合《井上馨关系文书》中与森恪相关的史料，先就森恪进行“满洲租借”的内在动力即国权思想进行探讨，其次对其进行“满洲租借”的重要条件即其与井上馨、益田孝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探讨“满洲租借”交涉的内在机制。

-
- 1) 藤井昇三首先确定孙中山曾向日本政府提出以“满洲租借”为条件向日本政府借款一千万的事实，具体参见『孫文と『滿蒙』問題』，日本國際政治学会編『國際政治』1964年，第26号。『孫文と滿州問題』，関東学院大学人文会編『関東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1987年，第52号。久保田文次则将“满洲租借”的时间确定为辛亥革命时期，具体参见『孫文のいわゆる「滿蒙讓与」論について』『中嶋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下巻，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編，1981年。杨天石则对“满洲租借”问题进行了介绍与考察，并对孙中山在此事件中所做所为归结于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上，具体参见《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俞辛淳则对“满洲租借”的真实性与时间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孙中山主张借款为先，在某种意义上反应了他在“满洲问题”的抵抗心理，具体参见《试探孙中山对“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 2)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李氏认为“孙中山，黄兴在铜官山、招商局、汉治萍借款无望成功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与森恪为代表的日本方面进行租借“满洲”的交涉。”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国初年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杨氏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前后进行的合办汉治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的借款谈判，本意在取得一笔经费，支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发放南京附近革命军队的军饷，同时支持北伐。但是钱款却迟迟不能到手……2月初孙中山不得不转面以租借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方紧急提供1千万日元贷款。”
 - 3) 小島直記：『洋上の点 森恪という存在』，中央公論社，1978年。小山俊樹：『評伝森恪 日中対立の焦点』，株式会社ウェッジ，2017年。樋口正人：『東亜新秩序の先駆』，株式会社カクワークス社，2018年。
 - 4) 梶井義雄：「滿州事変と三井財閥——山本条太郎・森恪との関係を中心に」『社会科学年報』1972年，第6号。小林昭平：「政友会総裁田中義一の中国政策と森恪（Ⅰ）——田中内閣組閣前を中心に」『政治経済史学』2007年7月、「政友会総裁田中義一の中国政策と森恪（Ⅱ）——田中内閣組閣前を中心に」『政治経済史学』2007年8月。「森恪の对中国策（Ⅰ）田中内閣期を中心に」『政治経済史学』2006年2月、「森恪の对中国策（Ⅱ）田中内閣期を中心に」『政治経済史学』2006年3月。「森恪の中国政策構想：滿州事変前後を中心に」『史林』2008年11月。
 - 5) 久保田文次：「孫文と「滿州租借交渉」・「日中盟約案」再考——俞辛燾氏『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によせて」『中国研究月報』2003年6月。
 - 6) 俞辛淳：《试探孙中山对“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第25-32页。

一 森格国权主义思想的形成

森格（1882-1932）：日本政治家，实业家。出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商工中学校，早年致力于大陆雄飞，后经三井物产支那修业生后，于1905年正式成为上海支店店员，为支店长山本条太郎所重用。1912年其曾参与到孙文设立中国兴业（后为中日实业）公司的工作当中，1914年担任三井物产天津支店店长，1915年起担任三井物产董事，致力于从中国获得利权的活动。1920年从三井退社，加入政友会并当选众议院议员。1927年在田中义一内阁担任外务政务次官，实际参与了东方会议。随后任政友会干事长，与军部结合推进积极的侵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曾担任犬养毅内阁的书记长官，同年暴毙。在森格早年大陆雄飞、国权主义思想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有其父森作太郎、著作家矢野龙溪、汉学家笹间洗耳等人。

森格生父，森作太郎原名三田作太郎，生于1854年12月3日，其父原为德川家旗本三田守盛，明治维新时曾参加维护幕府的彰义队，后转战函馆并战死。1868年作太郎被其父友人森真宣收养，并入籍成为其养子，改名森作太郎。森作太郎于青年时期曾就读于帝国大学法律科第一期，1876年7月毕业后入职司法省，随后先后担任大阪地方法院、大阪高等法院法官，1881年辞去法官职务，从事律师工作。1892年至1902年历任大阪市议会议长。另外他作为关西地区自由党人深受欧美文明及自由民主思想影响，曾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但是1900年作太郎在游欧之后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即由原来的崇拜欧美转为批判盲信欧美文化与欧美思想，主张回归东洋思想并发扬日本精神，同时倡导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以民族为中心统治的社会，是超越个人及个人集团拥有民族意识精神的全体……属于国家的人既不是单个的人也不是多数的个别人，而是全体的人……我不赞成资本主义，而赞成皇室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主义，也就是国家本位主义。”另外，他在关于中国的论述中，更是从国家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日本有支那才能称之为日本，支那若亡，若世无日本，日本之命运与支那之命运紧密相连。”⁷⁾在森格成长及在外公干期间，作太郎经常与其直接或写信讨论时政外交、经济劳农问题、政党问题，这些都对森格个人国权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后来森格个人收藏的图书中就能直接的看出，如德国政治学家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的《军国主义论》、索累尔（Georges Sorel）的《暴力论》、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告德意志同胞书》。⁸⁾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开始将目光投向离台湾仅有一海之隔的南洋。1897年著作家矢野龙溪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浮城物语》，该小说主要内容为一群拥有海外雄飞梦想的日本人，参与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小说，在当时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一节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了森格，“青山到处埋忠骨，世界无处不坟墓……吾将蹂躏地球、席卷无人之地，以扩日本几十倍之大版图，献与陛下，若不幸日本无此国力据之所有，则我与诸君，坐地为王”。⁹⁾受该小说的影响，年仅17岁的森格便有志于征服南洋，他在给大阪森家书生浅野茂的信中提到：“男儿生而志在四方，人生五十年，不成一番大事，实为可悲，帝国之小无以逞余志，逞志不仅在于帝国，更愿求志于天下，所至之地为埋骨地……余为早结学业，欲求资于兄，兄为我同盟者，为求他日能成大事，遂至书兄长，与其争小功于此小地，不如

7)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31-32頁。

8)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34-35頁。

9) 矢野龍溪：『浮城物語』，近世画报社，1906年，第29-30頁。

占领南洋之领土，献与陛下……君若欲知我志，请看明治三十年六月博文馆发刊《太阳》增刊《浮城物语》第六回大事业一节，今日之所书，实为入兵学校或为东京商船学校准备，静待余兄之回信，以作手续，勿将此事泄于我父。”¹⁰⁾ 从此可以看出森恪不甘于在日本国内成为一位普通人，而矢志于海外施展更大的抱负，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希望能为天皇争取更多的权益，从某种程度上说矢野龙溪《浮城物语》对森恪海外雄飞理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直接促成森恪海外雄飞、国权思想与中国结合的则是笹间洗耳（生卒不详）。笹间洗耳原为纪州藩士，幼时为三井寺雏僧，11岁时出走江户，投于幕末三剑士之一的斋藤弥九郎门下，由于用功刻苦15岁时被提拔为斋藤塾副塾头，而正塾头为后来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17岁曾加入彰义队，后随榎本武扬于五稜郭反抗新政府军，失败后被捕入狱，但其在狱中努力学习海外事情，并意识到日本若想成为世界先进国，则必须以产业立国，随后便投身于产业报国的事业当中，并鼓吹“日支提携”。在1901年森恪报考高等商业学校失败之后，笹间曾建议他前往中国发展并称：“日本将来的存立在于支那大陆的发展，开发（支那）未开的宝库，就必须提携支那。”¹¹⁾ 笹间的此番话促使森恪决定前往中国发展。1908年，森恪从中国返回日本，在探望笹间时，其再次告诫森恪：“三井虽为大财阀，但是不应仅拘泥于一财阀之位。所为或为不为者，应长将国家置于第一目标”，随后在问到中国的木材输出超额时，森恪无法说出准确数值，又被其训诫：“若为一三井职员不知未有不可，若将来欲成大事此则不行，必须要对支那之事了如指掌。”¹²⁾ 在笹间去世之后，森恪曾对笹间之子笹间清说：“开吾眼者乃君之父……非继承其志，无以报此恩”。¹³⁾ 由此可以看出笹间洗耳是直接促成了森恪将自己的国权思想与在中国获得利权结合的重要人物。

而森恪国权思想与在中国获得利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有了具体的体现。在革命爆发之初，日本民间人士萱野长知就曾向三井物产提出过15万日元的借款要求，由于当时上海支店机密费使用权限仅有10万日元，但是上海支店店员森恪以“革命必定成功，若是援助革命，则扬子江之利权必定收于三井即帝国之手”¹⁴⁾，因此违背会社规定强行向革命派发放了借款，此举虽遭到益田孝的痛斥，但是却成为三井援助革命派的契机。另外在1913年，革命派孙中山以合作铺设安庆到正阳关之间的铁道为由向三井物产提出二十万借款的要求时，由于藤濑政次郎认为此举不利于三井物产公司的利益，最终未能向孙中山提供借款，使铁路未能成功修筑，因此森恪对上海支店长藤濑大为不满，其在6月10日给未婚妻瓜生荣枝的信中提到：“安正铁道之事，若藤濑政次郎能以大肚量从大局着眼，听小生一言，出资建设，则今日无论如何，由我掌握，正因此连中只主张眼前之利害，终误我对支政策，仅用二十万元便可将安徽北部纳入我势力范围，作为三井中人，即便行此不法之事，吾心中亦无苦痛……借款不应仅为借款，其目的在于获得利权”。¹⁵⁾ 从此可以看出森恪在处理与中国的相关事务时，并非是将会社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亦即将国权扩张，从他国获得利权作为自己行事最高准则。

10)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80-81頁。

11)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91頁。文中“支那”，“满洲”等表述，均为历史资料原有表述，不代表作者立场。

12)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91頁。

13)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95頁。

14)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284頁。

15)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65頁。

二 森恪与井上馨和益田孝关系之考察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便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口号建设近代化日本。在经济建设领域，相继涌现了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益田孝等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创办或管理的企业为数众多，为推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同时这些企业及企业家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来自政治家的参与与支持，井上馨与三井物产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一例，在1871年11月11日岩仓使团出发前的欢送会上，井上馨被西乡隆盛讽刺为“三井的掌柜的”¹⁶⁾，此言虽为讥讽，但是从另一方面却反映了井上馨与财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益田孝（1848-1938）：佐渡相川人，其父益田鹰为佐渡奉公所地役人，精于算盘与剑术，由于其父文武皆优，曾先后被调到函馆与江户工作。正因如此，益田孝也随之前往函馆、江户生活，在此期间其曾先后随函馆通事、江户麻布善福寺美国公使馆通事石斧次郎学习英语，14岁时以“通弁御用”（御用翻译）之职出任幕府。1863年其随幕府使节团出使欧洲交涉锁国事宜，归国之后跟随陆军教官取得骑兵将校资格。幕府为维新派推翻后，其于1869年开始在横滨从事商业活动，但由于经营不善遂转投美国商馆，从事临时性工作。¹⁷⁾

益田孝曾在谈及明治维新政治人物时提到：“维新的元勋当中，我与井上（馨）的关系最为亲密。”¹⁸⁾这是因为益田孝本为幕府旧臣，由于井上馨的赏识，才得以在维新后出任政府要职。1872年春，益田孝与冈田平藏在从横滨前往东京的马车中，偶遇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益田孝经由冈田平藏介绍认识了井上，井上馨当日便邀请益田孝前往其住处做客。在做客会谈期间，井上馨提出希望其加入政府的要求，随后益田孝在与五代友厚商议后，接受了井上馨的邀请并于1872年4月8日出任大阪造币局造币头。至此井上馨作为大藏省大藏大辅，手下集合了涩泽荣一（时任大藏省三等出仕）、益田孝等得力助手。

1871年末，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为条约改正事出使欧美，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在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出国期间实际掌管大藏省。由于明治初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所以井上馨有意削减各省开支，贯彻其财政紧缩的意图，因此与司法省、文部省等各省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井上馨由于与诸省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再加上与司法卿江藤新平关系恶化，不得不于1873年5月辞去大藏大辅一职，宣布下野。¹⁹⁾同年益田孝也提出辞职，与井上馨共进退。下野之后的井上馨先创立东京矿山会社，又于1874年1月创办冈田组，并主要从事为陆军省进口物资，和米的输入、输出等业务。同年3月份，井上馨再次在东京银座创立先收会社，以“开万邦交通之大商业，专以皇国物产佩赋外国”为宗旨，主营出口贸易。²⁰⁾随后井上馨拟回政界，便将会社主要事务交由益田孝（东京支店长）与吉富简一（大阪支店长）负责。1875年，井上馨正式回归政界，12月即被任命为元老院议官，并作为出使朝鲜副全权办理大臣出使朝鲜。而关于社的有关事务，井上馨则将其委任给益田孝进行解散处理。

此时关于先收会社即将解散的传言恰好被三井的名代三野村左卫门听说，于是其直接找到井上馨希望

16) 堀雅昭：『井上馨 開明的ナショナリズム』，弦書房，2013年，第9頁。

17) 人物介绍参考：星野靖之助：『三井百年』，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第59頁。

18) 長井実：『自述益田孝翁伝』，成武堂，1949年，第422頁。

19) 井上馨侯伝記編纂会 編：『世外井上公伝』，内外書籍，1933年，第539-572頁。

20) 財団法人日本経営史研究所：『挑戦と創造——三井物産100年のあゆみ』，三井物産，1976年，第37-39頁。

继承先收会社的所有业务，并希望聘请益田孝继续出任社长。同年5月，井上、三野村、益田三人在井上邸会谈并同意成立新物产会社。1876年7月1日，三井物产正式诞生，初代社主三野村利左卫门，初代社长益田孝，另外副社长木村正干等人均从井上馨的先收会社直接转到三井物产中任职。可以说益田孝在明治新政权的发迹完全是依赖于井上馨，因此正如《三井百年》提到的那样“换句话说，益田社长其实是代表了井上馨在三井的势力。”²¹⁾

1877年三井物产在上海正式设立支店，成为该社最早的海外支店。1897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益田孝再次前往中国视察，在考察期间益田孝认为在中国要想事业有所发展，需要精通中国商业习惯、语言等实际问题的工作人员，因此在中国当地的实地养成便显得尤为重要，于是见习生制度应运而生。²²⁾ 随后支那见习生制度于1899年1月改为支那修业生制度，而正是得益于支那修业生制度，在后来与孙中山、黄兴进行“满洲租借”谈判的森格才得以于1901年提前来到中国，并于次年成为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修业生。²³⁾

三井物产的支那修业生制度的修业年限一般为三年，修业内容主要有汉语、英语、商业实习等，森格于1904年完成修业并成为三井物产的正式社员。在上海期间，其作为汉语老师御幡雅文²⁴⁾的助教又学习了两年的上海话与北京话。另外森格在学习汉语期间，更是每天坚持学习英语，据同为三井物产社员的高木陆郎回忆：“森格英语非常熟练，为了练习英语每天都会听写每日杂报，只读不足以记入脑中，所以会一句一句地写下来，正是有了上海时代的练习，后来前往纽约支店工作才会非常方便。”²⁵⁾ 另据店员尾崎敬义回忆：“(森格) 英语非常熟练……特别是与孙中山进行对话显得特别地勇敢。”²⁶⁾

1904年长沙开港，三井物产于1906年在长沙设立“出張所”，隶属汉口支店管辖，森格担任出張员，并开始对湖南方面进行调查。在此期间其曾将调查结果总结为《南清方面ニ企業スベシ》并以匿名的方式发表在1907年《中央公论》第6号上。而这篇发表在《中央公论》的文章，刚好为时任陆军大臣的寺内正毅看到，寺内遂致电益田孝询问有关情况。1908年4月，森格被东京总店召回，并在回京期间为寺内正毅所招待，益田孝作为陪食，亦得以参加晚宴。²⁷⁾ 也许正是这一次的进餐，森格给益田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其一直备受益田孝的关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位于纽约支店的森格随即被召唤回国，旋即又被派往中国，而关于三井急忙要将森格派往中国原因，或许正如高木陆郎所说：“曾经在上海以及湖南长沙任职的森格很早以前就与南方的有力者援以为知己，其中便有王一亭、陈其美、张静江等人”。²⁸⁾ 从以上可以看出，森格之所以能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调回中国除上述与其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有关之外，还与他同南方革命派素有交情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是森格之所以后来可以赢得井上馨信任与孙中山直接讨论“满洲租借”问题，除了以上

21) 星野靖之助：『三井百年』，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第55頁。

22)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03頁。

23)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02頁。

24) 御幡雅文（1859-1912）：号挥肃，明治时代汉语学者，长崎人，东京外国语学校卒，曾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教授汉语，明治31年在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工作期间，曾在东亚同文书院担任汉语教习，著有《华语跬步》、《沪语便商》等。

25)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05頁。

26)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05頁。

27)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39頁。

28)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376頁。

原因之外，极有可能和他同益田孝之间的姻亲关系有关。据《森格》所载，1911年12月到1912年5月为止，森格频繁往来于东京与上海之间，除了为三井与革命派之间的借款活动来回奔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海军大将男爵瓜生外吉的第三女瓜生荣枝之间的婚约有关。瓜生荣枝的母亲正是益田孝的妹妹，而当时帮森格操持婚约的正是益田孝本人，据《森格》中瓜生荣枝的兄长瓜生刚回忆：“森（恪）的姻缘是益田孝决定的，益田认为森格胜于山本，遂与其妹商量此姻缘……森（恪）在箱根塔之泽逗留数日，在去上海赴任之前，便已经定立了婚约。”²⁹⁾

可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森格才有机会与井上馨直接见面商谈。据森格好友田村洋三回忆森格曾为“满洲租借”事同益田孝与井上侯会餐，而在会餐过程中“森没有表现出一丝的紧张与害怕，并能够对各董事畅所欲言，井上侯是从明治维新动乱中过来之人物，（森格）却一点也不害怕，（井上馨）却爱森少年之豪胆。”³⁰⁾

至此井上馨、益田孝、森格三人关系正式理清，三井物产能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迅速地参与到革命派的借款活动中，与三井物产持续且深入的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关系。而三井物产的森格为何能够绕过上海店长与东京社长就“满洲租借”问题直接与益田孝以及元老井上馨接触，不仅仅是因为其语言能力突出，与革命派有交情等，其与益田孝的姻亲关系应该是他能直接从事该项活动的重要条件。

三 森格与“满洲租借”案

1911年10月，黑龙江的内田良平在前往朝鲜策动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援助革命派的途中得知三井物产作为泰平组合一员向清政府提供武器，遂致信益田孝要求三井支援革命派，而益田孝将此信转交给了元老井上馨，在得到井上馨、桂太郎、西园寺公望同意后，三井物产开始向革命派实施援助。而在此借款当中，据当时的孙文顾问山田纯一郎回忆“因为森氏为革命尽心斡旋，再加陈其美与藤濑政次郎合作，最终顺利促成了三十万元借款”。³¹⁾ 1912年1月，三井物产正式向革命派发放此借款。正因为此次井上馨帮助革命派促成与三井物产之间的借款，黄兴便致信要求井上馨“同情革命党并关心其金融问题”，同时表示“东三省是与日本有缘因之地，因此告诫同志不可在此地生起骚扰。”³²⁾

在革命爆发之初，日本国内对于中国的形势现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为不干涉对策，二为干涉对策。不干涉对策又分为任其事态发展与恢复原有状态两种，而干涉对策则分为援助清政府与援助革命派两种。³³⁾ 正是在日本政府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背景下，以井上馨为首的日本政要主张积极干涉并支持革命派，并在此期间积极的推动中日合办汉冶萍案、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案以及“满洲租借”案的发案与成立。

另一方面随着革命的发展，革命政府由于缺少经费，不得不面临着军队，政府解散的危险局面。因此革命派为筹措资金也同井上馨、益田孝为代表的日本政界与财界人物进行积极的借款交涉。1912年1月29

29)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57頁。

30)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157頁。

31)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377頁。

32) 升味準之助：『日本政党史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232-233頁。

33) 山本四郎：「辛亥革命と日本動向」，『史林』1966年，第49号。

日，在日本方面与盛宣怀签完神户约之后，由于合同的履行需要小田切、盛宣怀、孙黄三方的签字，2月1日三井物产的山本条太郎就致电孙中山：“根据汉冶萍中日合办事已完全洽妥……我已草拟目前借款所必需的文件，由敝处森恪君呈请阁下批准。该文件请阁下与陆军部长黄兴先生签字”。³⁴⁾ 2月2日森恪前往南京同孙中山、黄兴会面“小生于二日晨七时从当地（上海）出发，下午四时半抵南京，立即往访孙文，并促请黄兴参加。三人鼎足而坐，就当前至关重要之汉冶萍公司日中共同经营一事进行了交涉。虽有四处异议，但最终照我方希望，同意共同经营，顺利签署契约。”³⁵⁾ 应该是在协约签过程中，森恪又向孙中山转达了关于“满洲租借”的意见，会谈的主要内容见于2月8日森恪向益田孝汇报的书信。但在《原敬日记》中1月9日与10日，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内相原敬在拜会山县有朋与井上馨之后，听井上馨与益田孝说到森恪关于“满洲”的有关方案，即“利用此机会将东三省变为我之物品”并“有必要趁此时机得与革命党定立将东三省割让我等密约”。³⁶⁾ 另外在《森恪》中田村羊三的回忆中可以印证此案由其提出“满洲买收计划的发案者森（恪）通过益田孝会见井上馨，经过井上馨的介绍运动桂公树立此大计划，已经成功八九分，最后由于政府的反对，此案以立消告终”³⁷⁾，从此可以看出“满洲租借”成案于森恪，并由益田孝充当中间介绍人，以期策动高层井上馨。

在此次会谈中森恪向孙中山提到当今世界为“黄白对抗”之战场，为遏制俄国南下，保东洋和平则满洲应置于“日本保护之下”。若将满洲置于中国政府保护，则对中国政府来说更是“危险至极”，另外对于中国革命，森恪则极力的向孙中山主张：“若没有在地理上与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日本相助”，中国革命“或属疑问”。因此建议革命政府：“放弃命运既定之满洲，将其委于日本”，日本则必将“应允其要求，立即争取必要手段”。并称：“其实，桂公已向益田（孝）吐露此般密旨。若阁下有断然实行之意，（孙黄）二人中之一人，可秘密前往日本会见桂公。日本派军舰在阁下认为方便之地接迎，直驶（日本九州）三池港，再乘特别列车至京都，尔后促桂公自东京前来会见，往返约两周即可。”³⁸⁾

而关于“满洲租借”之事，孙中山向森恪表示从欧洲回香港之时“若知桂太郎有此意，定会直抵日本截夺”。而现在的话，孙中山认为：“时至今日，业已错失良机”，究其原因是在革命开始之时“全依余与黄兴方针之行事”，而在各省加入革命政府之后“我等既少兵权又少金权，大事须决于公议”。在陈述完以上内容之后，孙中山也向森恪说明了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已到极点”，若数日内没有资金支援则“或解散军队，或解散政府”，并称：“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得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皆因此故也”。如果有解决财源希望的话，必将“扫除南北异分子”，若“不幸在此五日内及九日以前”无法得到一千五百万借款，则“万事休矣”。最后孙中山向森恪作出承诺：“余等于今日，只要手中有钱，便可获军队之信赖，军队一得稳，凡事又可照约办，余或黄兴中派一人渡日，会见桂公，定满洲问题及革命政府大计”。森恪在听到孙中山对自己关与“满洲”看法的回应之后，便认为此事可为，并且成功率极大。因此其一方面利用三井物产的秘密电报帮孙中山向井上馨发送电文，希望井上馨能够帮助革命派筹措款

34)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4页。

35) 「森恪發電写益田宛」(1912年2月5日)，『井上侯爵家ヨリ交附書類』三井文庫所藏。

36)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卷3，福村出版，2005年，第210-211頁。

37) 山浦貫一：『森恪』，森恪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405頁。

38) 「森恪發電写益田宛」(1912年2月8日)，『井上侯爵家ヨリ交附書類』三井文庫所藏。

项³⁹⁾，另一方面迅速的向处于国内的益田孝发信报告孙中山已经“承诺租借满洲”，并催促益田孝迅速的为此事活动。

2月3日森格再给益田孝的信中提到：

财政穷乏，支那年末（旧历新年，笔者注，以下同）之前，若无一千五百万元则不能战争，革命政府则陷混乱。因与汉冶萍五百万借款成立之故，（革命政府）以招商局为担保正与邮船会社、英独美国等进行一千万借款交涉。若五日之内此借款不能成立则万事休矣。孙黄将与袁世凯缔结合议，并将政权让与袁（世凯）。孙已承诺“满洲租借”。因此为防止革命军解散，在汉冶萍五百万日元之外，若能立即借款一千万，则与袁世凯终止合议，孙文或者黄兴前往日本制定满洲之秘密协约。资金不能入（革命派）手，则军队恐有解散之虑，若离南京则必有变事，满洲之事若决意实行，四日之内电告其借款一千万，并应使之中止与袁世凯之合议。⁴⁰⁾

由于森格报告益田孝信，均出现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的《井上馨关系文书》与三井文库所藏的《井上侯爵家交付书类》当中，所以联想到在革命爆发之初，井上馨有为革命派“操心金融”的举动，如上文提到森格曾与益田孝一起就“满洲租借”之事一同益田孝进行会餐，可以推知井上馨或为“满洲租借”活动的主要幕后指导者之一。

2月4日益天孝又给山县有朋打电报，报告森格已从孙中山处取得“满洲租借”的承诺，并催促山县等人早做决定。

据南京电信，森格已即刻作为无责任者进行会见，孙已承诺租借南满之事。但支那元旦以前若无千五百万元，除将政权让于袁世凯外，别无他途。革命政府财政困乏实无计可施。对大治汉阳盛宣怀交涉之五百万借款成立后，尚需一千万，正以招商局担保与邮船、三井、英德美等交涉中，五日内若无成立之望，万事皆休。若日本承担此借款，已允中断对袁讲和，孙文或黄兴即刻来日缔结秘密契约。已与井上侯电报述及此事，祈答电如下旨：孙、黄两位愿在日本指导下处理对日美关系之意已悉，山县、桂两公处已转致阁下之致意，近日将任命代理人等。上述之事关系重大，祈速就此裁决与否商议，并且与政府协商，尽速回答之。⁴¹⁾

39) 「孫文・黃興電報写」(1912年2月3日)，『井上馨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井上侯爵閣下

由三井森君处得闻閣下赞助之良意，感谢千万。今后新政府与日本财政上之关系凡百当从於閣下之指导必有统一之办法，以企最圆满之结果。近日任命代表来谒贵邦，惟閣下有以教之前以电信奉闻，今更函白诚意，区区不尽伏，祈亮察仰仗鼎助，無任拜。禱即颂起居，山县桂两公处亦乞代达鄙忱为荷。再者西园寺侯处未能直接通函亦乞代为致意。

孙文叩

40) 「益田・森往復電報写」(1912年2月3日)，『井上馨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41) 尚友俱樂部山県有朋關係文書委員会：『山県有朋關係文書』，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227-228頁。

从益田孝给山县有朋的信中“对大冶汉阳盛宣怀交涉之五百万借款成立后，尚需一千万元，正以招商局担保与邮船、三井、英德美等交涉中，五日内若无成立之望，万事皆休。”可以看出形势之急迫，容不得日本当局有过多的耽误。同时从此信中可以看见森恪在“满洲租借”所处的地位为“无责任者”，从“近日将任命代理人”可以进一步的推测出森恪并非为此次交涉事件的正式人员。另外从“已与井上侯电报述及此事，祈答电如下旨”可以进一步确定井上馨为“满洲租借”交涉幕后重要人物。自此关于“满洲租借”的运作机制渐渐清晰，即森恪于中国与孙黄进行“满洲租借”等相关交涉，而益田孝在日本呼应森恪并将相关信息及时的通报给日本高层即元老井上馨，而井上馨根据益田孝提供的信息策动其他政府实力者如山县有朋等人来进行“满洲租借”。

但是山县有朋对于对革命的态度，却经历了多次的变化，1月9日在原敬访问山县时，山县曾对原敬说：“赞成利用此机会与革命派定立将东三省变为我手之密约”，但原敬则提到“此事必经内阁之决议”⁴²⁾。1月14日，山县出于对俄国的不安，提出：“洞察今日清国之形势，若满汉破裂，而无其他救济之道则易陷窘势，此论断未有大差，为保护我政府满洲租借地与铁道，预防一般骚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固，应判断适当时机出兵满洲”。⁴³⁾ 1月15日井上馨访问桂太郎，并与其进行长谈以寻求益田孝面见山县有朋的机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出兵逐渐变的不可能，2月8日桂太郎致信山县有朋称：“此际出兵，外国恐有质疑，另若不向内阁请求出兵费用则议论百出”⁴⁴⁾，9日陆相石本新六再次致信山县称：“鉴于外国与支那之关系……议会之关系，此间非为最佳时机”⁴⁵⁾，自此山县开始对满洲问题表现出消极状态，并在此期间未与益田孝回信。

2月5日孙中山致电森恪“希望迅速得到一千万日元的贷款”的回答⁴⁶⁾，面对孙中山的催促，并非政府正式任命的与孙中山进行“满洲租借”交涉的森恪，在中午就将此信转发给了益田孝，随即下午益田便回电森恪：“井上侯处尚无回音，甚念，对招商局担保借款事亦令人担心。另祝成功。益田孝。”⁴⁷⁾ 2月6日下午孙中山再次致电森恪：“与袁世凯的媾和协议延期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2月9日前给予答复。”⁴⁸⁾ 在接到孙中山的催促之后，森恪旋即将此信发给益田孝，益田孝于2月8日向森恪回电，并要求森恪不要对南北议和发表过多的意见。

(革命政府)与袁世凯之和议我方无论如何不容置喙，但应告知我方深刻同情孙黄(革命派)，予等亦期盼孙黄以合适之地位达成妥协，井上侯难以直接回信，目下汉冶萍之二百五十万元、将努力于明天送至。另使铜官山明日给予确答，招商局借款若成，亦当努力送款，不致拖延。关于满洲之事，另向(孙黄)劝告若能派遣一人抵日签订秘密之协约，如此便能得到更进一步之同情。⁴⁹⁾

42)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卷3，福村出版，2005年，第210頁。

43) 转引自山本四郎：「辛亥革命と日本動向」『史林』1966年，第49号，第44頁。

44) 转引自山本四郎：「辛亥革命と日本動向」『史林』1966年，第49号，第45-46頁。

45) 角田順：『満州問題と国防方針』原書房，1967年，第763頁。

4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卷6，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頁。

47) 「益田・森往復電報写」(1912年2月5日)，『井上侯爵家ヨリ交附書類』三井文庫所蔵。

48)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卷6，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頁。

49) 「益田・森往復電報写」(1912年2月8日)，『井上馨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从此信中可以分析出，日方为表达深刻同情，向革命派做出了两项承诺，即尽快将汉冶萍借款的二百五十万和如果招商局借款若成，则努力送款。而就在2月7日森格便向革命政府提供了借款50万，而正式的放款日期应为12日，由此可以看出森格对于革命派取得政权继续与北方政府对抗的急切心情。⁵⁰⁾而关于井上馨为何不便回复，根据《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2月6日在首相西园寺公望宅邸，井上馨与西园寺以及桂太郎记性了一次密谈：“(西园寺公望)与井上侯，内田(康哉)外相、牧野(伸显)农相、山本(达雄)藏相等人会谈，其内容大致涉及大仓组借款、招商局借款契约、汉阳制铁所、大冶铁山为中心的日清合并计划，另外满洲骚乱议题也被提出讨论。同时内田外相也报告了昨日从清国传来有关形势的诸报告，结果为与清国相关的诸借款均与外国有关系，会议遂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处理清国问题”⁵¹⁾，而内田所指的英国抗议之事正是革命派与日本之间的招商局抵押借款案，招商局抵押借款案的幕后关系者正是井上馨⁵²⁾，可能正是因为此次会议，让井上馨倍感压力，于是便不再积极主动的回应森格及革命派的要求。

2月11日上午1点55分森格又从南京给益田孝发送电。

据孙黄所见，至招商局借款案了结尚有难关应需时日不能依赖，军队恐有解散之虑，汉阳铁厂借款之五百万元之外，在支那新年之前钱款不到彼等手中，则不能离开南京，彼等已承诺“满洲租借”，还请十日以内供给此一千万元，若以上内容被承认，则黄兴将直接赴日本缔结秘密契约，望即刻予以确切之回答，乞尽力以成大业。⁵³⁾

不明日本国内情况的森格仍然不断的催促，希望益田孝能够尽快的运作日本高层，向革命派放款。在接到森格这封来自南京的加急电报之后，益田孝在将相关书信递交井上馨之后，仍然未得到井上馨的任何指示，于是益田孝遂于2月12日连发两封加急电报给森格，不再提“满洲租借”之事，而是要求森格尽快劝孙、黄增发招商局股票，以用来筹款。

为便于即时调拨资金，余等劝孙、黄立即召开招商局临时股东会，发行附加七分利优先股票，其资本额再增一千万两，其中五百万两由日本人应募之，余五百万两日后可依支那人之希望，以为借款之条件，当由日本人认购。

下午4时，益田再电森格。

接前电，盛宣怀倘有大体满意之意，且约定总会决意时以全力相助，我可立即予以实行。目下除上述而外，并无立即筹措资金之其他良策。议案倘得承认，余相信数日内款额即会汇拨，此电乃与邮船公司商妥之结果，要新政府保护外国人之股票所得权。⁵⁴⁾

50) 山浦貫一：『森格』，森格伝記編纂会，1940年，第395页。

51) 「首相邸会合内容」(1912年2月9日)，『東京朝日新聞』，第4页。

52)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53) 「森格發電写益田宛」(1912年2月11日)，『井上馨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54) 「益田・森往復電報写」(1912年2月12日)，『井上侯爵家ヨリ交附書類』三井文庫所蔵。

从以上两封电信可以看出，12月益田孝给森格的回信，应该是对11日森格来信的回答，从中可以看出益田孝也认识到了日本高层已经不可能就“满洲租借”之事向革命派提供借款，而能迅速向革命派提供资金的，除了以招商局为突破口进行借款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希望森格向孙黄二人转告“议案倘得承认，余相信数日内款额即会汇拨”。

至此关于“满洲租借”的大致脉络方才逐渐清晰，即：森格于2月2日，借签订汉冶萍借款之机，向革命派提出“满洲租借”这一提议，但是孙中山并没有积极地给出回应，反而告知革命政府实际情况“若无一千五百万元则不能战争，革命政府则陷混乱”，随着2月5日孙中山的催款和2月6日向日本传达与袁世凯的谈判拖延到9日，面对催促，益田孝只得调拨资金，先给革命派汉冶萍的借款，并承诺“招商局借款若成，亦当努力送款”。2月11日面对森格的再次催款，益田孝只得向森格提出增发招商局股票，以购入股票来变相向革命派提供资金。从孙黄与森格以及其背后的益田孝与井上馨的交涉来看，日本方面随着国内对华政策的趋于统一，便已经开始放弃“满洲租借”这一事项。而森格却在此种情况下，仍然极力的推动“满洲租借”的相关事宜，其除了不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之外，其内在想要取得中国利权的国权思想应是其不遗余力从事该事件的根本动力。

这样，在内外交迫的形式下，孙黄革命派在2月9日之前并没有得到来自日本方面一千万日元的放款，遂不得不与袁世凯进行和谈并于2月12日签署南北和谈协议，随后清帝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作为后继者。15日袁世凯即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满洲租借”至此不了了之。

余论

关于“满洲租借”，与孙中山曾有密切关系的日本人宫崎滔天曾于1921年就孙为何要将政府让与袁世凯时提到“第一次革命成功后，(孙文)组建南京政府，进而欲兴北伐军之时，与日本资本家之间定立的军费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为井上馨侯所破坏，不得不含泪与袁世凯妥协，将南京政府让渡于人，此事人尽皆知。”⁵⁵⁾ 从此处可以看出，在革命的初始阶段，来自日本的资金对于革命的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满洲租借”的重要参与者森格来说。其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亲作太郎、作家矢野龙溪、笹间洗耳等人的影响，从少年时期便逐渐形成了国权意识以及海外雄飞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与革命派的进行“满洲租借”交涉的主要动力，这种国权意识具体的表现为不将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始终将利权的获得作为最终目标。同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当中，容易为人所忽视，但具有重要作用的便是历史主人公之间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在推动历史事件的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满洲租借”案中，井上馨与益田孝之间的私人关系，益田孝与森格之间的姻亲关系，正是森格策动“满洲租借”交涉体制的重要条件。

通过森格与孙黄就“满洲租借”过程中形成的交涉机制可以大体的概括为：森格作为发案者在中国具体交涉，益田孝作为沟通者在日本传递信息，井上馨作为幕后指导者运作高层。但是这一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参与者均非政府内部实际当权者，虽然井上馨作为元老在政界拥有极高的地位，但是决定任何重

55) 宫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宫崎滔天全集》卷4，平凡社，1971年，第307-310頁。

大的事项均需通过政府内部协调并进而形成统一意见实施。因此伴随着日本政府内部随着革命事态的发展逐渐形成“慎重”，“统一”的意见时，这个由在野人士组成的交涉体制即容易走向失败。

